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

熊辉 ◎著



人民出版社

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

熊辉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苏向平

装帧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熊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041-2

I. ①翻… II. ①熊… III. ①诗歌—文学翻译—研究—中国—现代
②新诗—诗歌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9196 号

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

FANYI SHIGE ZAI ZHONGGUO DE JIESHOU

熊 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01-016041-2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顾 问：黄蓉生 张卫国 崔延强 靳玉乐

主 编：吕 进

副主编：熊 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本益 段从学 江弱水 靳明全

蒋登科 李 震 梁笑梅 陆正兰

吕 进 王 珂 王 毅 向天渊

熊 辉 颜同林 张崇富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	-----

第一部分 翻译诗歌：观念与方法

翻译符号系统的特征	003
潜翻译：一种客观存在的翻译类型	012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标准理论的演进	026
朝圣路上的文学姻缘：钱钟书的翻译观念	033
翻译诗歌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042

第二部分 翻译诗歌：影响与建构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061
翻译诗歌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	071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创作的关系	083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语言的欧化	090
以译代作：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	101

第三部分 翻译诗歌：传播与接受

阿克梅诗派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15
百年中国对兰波的译介与形象建构	127

乔叟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140
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	148
五四时期鲁拜诗的译介热潮	160

第四部分 翻译诗歌：文化与政治

“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	173
现代翻译文学语言的半殖民性与解殖民	191
“文协”的抗战诗歌译介活动	200
历史束缚中的自我歌唱：何其芳的诗歌翻译	210
个人审美与时代诉求的强力结合：冰心的诗歌翻译	224
“共名”时代的情感诉求：邹绛的诗歌翻译	235
后 记	251
丛书后记	252

第一部分

翻译诗歌：观念与方法

翻译符号系统的特征

任何符号都必须被置入一定的系统中才会显示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任何符号学的研究必须研究系统，不然毫无意义”^①，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翻译符号由于存在样态和文化属性的不同而使其系统与普通符号拉开了距离，正因如此，本文从符号学系统的一般观念入手，阐明了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系统特征形成的各种原因以及对翻译符号发展带来的可能性贡献。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初始符号体系”^②，因此，本文所谓的翻译符号仅仅指狭义的语言符号，本文所谓的语言也仅仅指特定文化范围内的民族语言，而不包含 20 世纪初风行的“世界语”或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重合现象。

符号学关注的重心在符号系统而非“部分”或组件，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寻找结构主义所谓“模式”的基础上使符号通向一条被理解的道路。任何符号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符号系统中才能产生和被接受，游散在外的个别符号离开了符号系统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这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引证且“先见”性地认为正确无误的符号系统论观点在面对翻译符号的时候却出现了破绽，或者说翻译行为的发生以及翻译文本的产生可能会带来符号学领域内很多术语范畴的扩展或更新。此语既出，必然招致很多符号学者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否定，事实上，本文展开的论述也并非要否定或推翻系统论，而是在高扬符号学研究中系统优先地位的基础上，从翻译文本这个符号群所包含的具体符号出发，认为符号学中的系统论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①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80 页。

空间和必要。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在谈翻译的语言问题时提出了“阐释语言符号的三种方法: 符号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 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或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 同时他将这三种翻译方式标识为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号间翻译 (Infersemiotic translation)。^① 根据雅各布森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的看法, 语内翻译无异于一种重述 (Rewording), 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仍然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 语际翻译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 (Translation proper), 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此时不再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 符号间翻译则完全是一种“质变” (Transmutation) 过程, 是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对语言符号的替换和阐释过程, 此时的翻译符号与原文语言符号大相径庭。因此, 本文所谓的翻译符号即狭义的语言符号, 有如雅各布森所谓的“语际翻译”, 只是翻译符号不再单纯地隶属于原语或译入语符号系统, 其在具有一般符号系统特征的同时又具备了自身的独特性, 这也成为本文探讨翻译符号系统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系统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则, 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处于某种或某几种系统中, 但三者 (符号、系统、多元系统) 多隶属于同一语言—文化的范畴, 或者说, 某种符号系统只在特定语言区域和文化范围内才会被理解成是有意义的, 尤其对语言符号系统而言更是如此。符号学名家特鲁别茨柯依 (Nikolay Trubetzkoy) 在他去世前才完善的音位学备受系统论学者的青睐, 它表明具体的符号即便出现细微的变化, 但只要没有超越符号不约而同地遵守的既定规则, 也能在某种系统中被理解和接受, 明确地证明了系统之于具体符号的重要性。但不能忽视的让该理论生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该音位学仅在特定的文化范围乃至地域范围内生效, 离开同一语言系统后的音位学就会使诠释陷入瘫痪。恰恰是让符号被理解的系统的同一语言—文化属性给翻译符号系统设置了樊篱, 因为翻译符号必然突破单一的语言—文化的界限而具备原语和目标语的双重特质, 倘若要在某种语言—文化范围内对翻译符号的系统作出充分的论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当然, 具体语言符号的多系统性或符

^① [俄] 罗曼·雅各布森:《翻译的语言方面》,《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等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2 页。

号系统的跨文化性并非翻译符号独有的特征，如汉语中的外来词表示的意义与其在原语环境中大抵无异，但它却借助汉语媒介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应该说，这样的符号就兼具了原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系统的色彩，只是孰淡孰浓的问题。外来词中的事物性名词如沙发—safa 等所具有的跨语际—文化的特征还不算很明显；像“滑特卢”—Waterloo 这样有“故事”的外来词则具有十分鲜明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征；更有甚者像“一切 ok 啦”“他看起来很 high”中的词汇直接以原语的样态置入异质的汉语中，其隶属的语言—文化系统必然不是单一的。外来语言符号是怎样融入汉语系统的，在进入汉语的序列时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翻译符号的系统具有跨语际—文化的特征，不再拘囿于单一的语言和文化范围内。五四前后的思想革命和文学变革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①，翻译活动的中兴直接导致了翻译理论的活跃，郭沫若对翻译符号表意的“混乱”深有体悟：“翻译之所以困难，并不是了解原书之为难，而是翻译难得恰当之为难。两种国语，没有绝对相同的可能性。而一种国语中有许多文字又多含歧义。譬如，A 字有甲乙丙丁数义，在译者本取甲义去译书，而读者却各取乙丙丁数义去解释，于是与原义便大相径庭，而解释便互相争执不下了。……两种国语中之绝对相同语既少，一种国语中之歧义语又多，对于原文的语神语势既要顾及，对于译文的语神语势又要力求圆润，译书之所以困难，正在这些地方。”^② 郭沫若这段话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尤其是对两种语言意义的差异作了反复的强调，意在使人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去认识翻译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翻译结果的“宿命”，最终从意义的角度去认识翻译之难和跨语际翻译实践必然面对的诸多挑战。事实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因为翻译语言符号“对于原文的语神语势既要顾及”，同时“对于译文的语神语势又要力求圆润”，这就使其被两种文化下的两套语言系统所“折磨”，但最终译者在原语和目标语的撕扯中选择了妥协，站在了中间的立场上而使翻译符号具有两种语言—文化系统的特征，并最终导致翻译符

①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马祖毅：《翻译理论与务实丛书总序》，引自《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年版，第 1 页。）

② 郭沫若：《反响之反响》，《创造季刊》（1 卷 3 期），1922 年 11 月 1 日。

号意义的模糊和接收的困难。例如，穆木天发表在《洪水》杂志上的《万雪白（Ch·Van Larberghe）的两首诗》中的《伊扶之歌》^①之一节：

到了晚上，
些个黑色的天鹅，
或是些个暗淡的仙女，
出来从花里，从西东里，从我们里，
这是我们的影子。

这节诗歌较能反映出翻译符号的跨语际—文化特质，第四行完全是原语的表达方式，按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应该是“从我们东西方的花丛中走出来”。仅就英语翻译成汉语而言，翻译符号所具有的该特征可以和“欧化”现象联系起来，推而广之可以归纳为翻译符号的“外化”现象，也即是符号学中符号横组合发生了变化，翻译符号的横组合相对于目标语而言已是两重天地。“外化”一词本身就表明了目标语向原语靠近或已具有原语的部分元素，不管是两种语言纠结的被动效果还是目标语向原语积极靠拢的主动结果，都显而易见地标示出翻译符号系统具有跨语际—文化的特征。既然翻译符号的系统具有双重的语言—文化特征，那根据符号学家对符号的定义，即“发送者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对方（这对方是人、其他生物，甚至具有辨别认知能力的机器）能约定性地了解关于某种不在场或未出现的某事物的一些情况”^②。特别是符号接收环节中的“约定性地了解”可能会引发人们对翻译符号合法性的思考，毕竟翻译符号超目标语系统的特征即是超越了目标语信息接收者对符号约定性的理解习惯。比如，主张“硬译”和“宁信而不顺”^③的鲁迅，其译作中的语言符号在表达和排列方式上主要遵循了原语系统，破坏了人们约定性的对符号信息的接收方式，因此在目标语境下失去了读者，从“佶屈聱牙”^④的《域外小说集》的销量以及后来鲁迅劝慰人们“硬着头皮”^⑤读完他的译作等实例中即可窥见一斑。但事实

① 该诗载《洪水》周刊第1期，1924年8月20日。

②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页。

③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5页。

④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⑤ 鲁迅：《〈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记》，《春潮》月刊（1卷3期），1929年2月15日。

上,这并不妨碍翻译符号在目标语中的合法性地位,既然符号是约定性的,那新符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送”和“接收”,就会逐渐被“约定”到目标语系统中,成为系统的有效“组分”。叶公超曾认为鲁迅翻译作品使用的语言符号不符合当下汉语表达习惯,他遵照鲁迅的建议“硬着头皮”读了几遍也没有读懂,自叹也许只有“等待文字改造成功之后,再来温习旧课”^①,才能读懂鲁迅的译文,恰好说明了翻译符号很难在短时间内进入目标语系统,而一旦其融入目标语系统中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恰如鲁迅所说:“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②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奠定了翻译符号的可理解性,从而保证了符号行为的完整性。如果离开一直以来人们所认为的语义对等的翻译基础,那我们还能在不同的符号之间继续文化交流吗?我们还能通过掌握他语言进行翻译并进入另一个语言建构的世界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的观点为我们理解翻译符号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翻译研究走出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一部作品是否可译的问题具有双重意义。或:是否能在作品的总体阅读中找到胜任的译者?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本质是否适合翻译,因此,仅就这种形式的意义来说,而要求翻译?”^③本雅明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考虑了符号的发送者和编码—解码过程,并没有考虑作为符号接受者的译文读者,他将翻译过程中突破了一种文化和一套系统的翻译符号界定为“纯语言”(Pure language),它“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就像那不可表达的、创生性的太初之言,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④。因此,本雅明的翻译观念摒弃了原文符号的原初性、译文符号的忠实性以及普遍主义所谓的两种符号承载信息的对等性,否定了在不同系统和不同文化下的两种符号可以直接有对应词汇的假设,而将翻译文本的语言符号引入了纯符号的境地。根据本雅明的

① 叶公超:《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新月》月刊(第4卷第6期),1933年3月1日。

②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6页。

③ [德]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等译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观点,原文的符号系统和译文的符号系统是互相补充的,翻译符号可能表征出比原符号的翻版或复制品更加丰富的意义内涵,两种符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翻译中相互关联。它们相互补充……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完整性能够代替这样一种完整性,或者说这样象征性的互补性”^①。本雅明的“互补性”观念对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翻译的起源和意图及各种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时获得了新的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不再是建立在可译性视野内的寻找不同符号间意义对等的交流活动,原文不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翻译符号和原文符号共同建构了翻译文本的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纯语言符号呢?刘禾认为,“纯语言属于上帝的记忆王国,原文和译文在那里以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着”^②。既然存在着这样的符号,那作品的翻译就存在着可能性,不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理会“纯语言”并由此踏上翻译的征程。本雅明所谓的在翻译中产生的“纯语言”概念实际上来自荷尔德林,荷氏提出纯语言的目的是想在“他所翻译的古希腊语和现代德语之间开辟一个文化和言语上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既不完全属于希腊语,又不完全属于德语,而是更贴近所有人类语言所共有的东西”^③。简单地说,荷尔德林提出的“纯语言”兼具了古希腊语和德语的特征,从而使译文能够被懂德语和希腊语的读者所接受。也就是说,荷尔德林认为译文的语言应该隶属于原语和译语两套系统,二者“以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于译文语言这样的特殊符号中,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否则原文或译文都可能成为不被理解的“零符号”(Zero-sign)^④。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形成的客观原因在于翻译行为的交流目的。译者为了更好地在译入语国中传达原文的内容,为此他不能将原语符号与目标语符号中的一方置于压倒另一方的地位,否则就会滑向优势符号一端而无法平等地对待正在交流的两种文化。英国学者艾伦·达夫(Alan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0页。

④ 按照赵毅衡先生的观点,“零符号是没有被接受的符号,或确切地说,指过程被打断的无效符号。它之所以还是符号,因为它有传出信息的可能性。”(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6页。)